



专访哥廷根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傅晓明

大数据指导未来决策

傅晓明，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成员。他于1994年获东北大学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学士学位，1997年获该校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，2000年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。同年底至德国，先后就职于柏林工业大学、哥廷根大学，现任哥廷根大学讲席教授、计算机研究所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、中德社会计算研究所所长。

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

谈合作

抢市场还是重质量？看中德美IT企业发展

傅教授谈到团队目前几个主要的研究项目，例如云计算，例如移动网络，如何根据未来发展需求改造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设计和体系。其中不可避免地谈及德国、美国和中国在该领域的一些不同。

“手机或者移动设备的使用人数早已超过台式机，而且不得不承认，移动计算在中国的发展要比德国快，比如手机支付、各类手机应用，包括共享单车的模式。德国人接受新鲜事物有个滞后期，而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气氛比德国、欧洲整体环境要好。IT这个行业，如果不去考虑长远企业目标，不引领潮流就会落后。德国人做事情需要沉思半天，准备好了并经过论证证明非常完备的方案才开始行动。”

“美国IT巨头，但凡出了个未成熟的新产品就给用户使用。微软就是个典型的案例，把各个试用版给用户用完了，自己再来做调试。欧洲是测试到低于十万分之一的故障概率后才推上市场。当大家都在推陈出新时，德国人还在想着把产品做完美。IT技术每半年就产生新的概念，德国人还要花两年去调研，等到方案出来，人家已经淘汰旧版本了。”

他也提到了中国企业。“像华为、阿里等中国公司的创新文化还是很厉害的，他们通过人力资源优势和勤奋和服务的精神，把很多西方公司无法顾及的方面弥补回来。西方的产

谈专业

花费一半以上精力研究大数据

近年来，傅晓明教授花费了个人一半以上精力的项目方向，则是社会计算领域，简单来说就是大数据。“在大数据环境下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数据，最后都可以用于挖掘社会规律和指导社会实践的。”

比如针对某个具体地区一个人每天出没的场所，如果他居住在富豪宅区，每天往返高新技术开发区，那么判断这可能是一名从事高端工作的人士，或者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中产阶级；如一个人居住在一个相对普通的平民区，又到很高端的写字楼上班，可能这人是一名门卫或者清洁工……

谈大学

傅教授在哥廷根呆了15年，他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在老市政厅广场，他给记者介绍每个哥廷根博士生都要亲吻女孩铜像的故事。他在这里不仅因为生活愉快，也因为哥廷根大学给他的高自由度。

“我在2006年拿到了3个大学的终身教授位置，哥廷根大学说很愿意留下我，给我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，我很感动。也是因为高度的国际化环境，我想其他没有哪个德国大学会让我用英语给本科生上课，要知道第一次时还是15年前，而且我拿的是非德国、非西方的学位。在这里，一切



上图为傅晓明教授。

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摄

品固然可靠，但一旦出了问题，推三倒四，反馈滞后经常需要一个星期，客户就不满意了。而当诸如法国电信、德国电信、英国电信等西方公司需要花三五个星期才能解决问题时，华可以用半天、一天，最迟三天就把故障全面解决，并非每一家公司和个人都能吃得了这个苦。”

在IT产业，占领市场尤为关键。傅教授说：“当市场有一半是你家江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定义市场规则了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互补。

你可以有美国人让客户查错的胆识，又提供迅速的售后服务，注重占领市场，再去提高用户体验。德国很多小企业，在各自领域都是顶呱呱的，但全局观有所欠缺，他们没想着要做大做强。所以德国还是需要像博世、西门子这样的大集团在前面冲。美国虽然现在的制造业不怎么行了，但各类专利还是掌握了一大堆。靠着这些高端技术专利，收取着各国包括中国企业很多专利使用费，这是美国在国际上创收利润的一大部分。”

谈家庭

谈起儿子 心中满满喜悦

德国大学名城哥廷根，在第十届中学生“汉语桥”德国预选赛的现场，记者见到了傅晓明教授和他的妻子。在去往其办公室的路上，傅晓明教授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对青少年儿童语言学习、自我成长、待人处事的体会。“开朗，敢于与外界接触”是傅教授颇为看重的品质。

傅教授的儿子今年4岁，和许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，好动，身体里有花不完的精力。但是挺乖巧，在比赛现场不吵不闹。他爱跟儿子玩耍、对话。在著名的挽鹅少女铜像前的广场上，儿子一会儿骑在爸爸肩上，一

会儿拉着爸爸的手转圈，在咖啡厅里，问孩子能否“和爸爸分吃一块蛋糕”；儿子鞋带松了自己不绑，说了句“爸爸，请帮我绑鞋带。”傅教授一边俯下身一边回应，本来应该你自己来，但你用了“请”字。看得出来，他此时的内心应是充满了喜悦和欣慰。

在哥廷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办公楼，记者看到了傅教授所在的楼层中央摆着一张大乒乓球桌。

傅教授笑称这是中国特色，毕竟研究团队里亚洲学生占的比例不低。但他有规定，每天下午5点之后才可使用。

谈经历

三分钟的回信犹豫了三个月

傅教授与其他大部分华人教授的经历不甚相同，他是在拿国内博士学位后，才到德国后获得教授位置的。“来德国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。我在一个国际学术讨论分发邮件里，看到了柏林工大招聘研究人员的消息，其实已过期一段时间了。我就写了个简短的邮件，也没正式申请，作简要自我介绍并询问位置是否还在。没想到3分钟内教授就回复我了，欢迎我去，而且还附上了他和助手关于我的德文讨论过程。”除了德国，他还有中国贝尔实验室、英国兰卡斯特大学、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以及日本东北大学等科研院所的选项。

3分钟内的回信，却让傅晓明犹豫了3个月。“农村的孩子，没什么期待，当时觉得无所谓去哪。我德文不通，当时对德国也不了解。后来询问系里一位当过洪堡学者的教授，他力荐我去德国。”等到他答应柏林工大，已是3个月后的事了。而拿下签证前往德国，则是博士毕业半年后的事情了。

他从柏林辗转来到哥廷根。当时哥廷根给他提供的只是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，但这个老城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好。“我一来到这个城市，不管跟谁打交道，工作上的人也好，市民也好，大家都脸上充满微笑与自信，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，而且都愿意用英语交流。”

“柏林那时候还不算是国际大都市，那会儿去外管局，从凌晨3、4点开始排队，到下午3、4点才能出来。

窗口的人不和你说话，冷冰冰的，维持秩序的人也常常对等候的人无端训斥。”他说，可能是一开始恰好碰到的这些经历，给了人一种不适感。

尽管如此，傅教授也没有否认柏林工作的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和提升。“不管是同事的支持，工作上的合作互动，都非常好，有了很多产出。那一年半学到了很多，不论是研究的基本方法，团队合作的精神，如何指导学生，如何将科研与产业应用结合……那时候也清晰地体会到他们的工匠精神。”他解释道：“在国内，如果是企业资助的项目，对方一般会一直盯着你要产出，要做汇报；在柏林我们做西门子的项目，我每设定一个研究课题，对方认为有偏差他会提出来一起想办法；我每提一个点子，对方也会一起来讨论该如何往该方向深入……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合作者。很多中国、美国公司出完钱了就不一定有这个耐心，这么细致地和你讨论。长期下来，我在与柏林工大及西门子的同事们合作中收获匪浅。”

柏林的工作经历，也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诸多基础，包括人脉网络。有的同事成为了自己的博士生，后来成为其他大学的终身教授，有的成了欧洲定义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委员会成员。他也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德国电信的朋友，后来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。那是一个欧盟研究项目，他在该项目即将签约时得到德国电信邀请，顶替突然退出的思科公司。